

# Female Images in Feudal Era—A Case Study of Fan Yi in *Thunderstorm*

Yan Li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28, China

## Abstract

This study centers on Fan Yi in *Thunderstorm*, exploring the tragic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female figur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feudal era. Subject to the oppression of a feudal autocratic family, Fan Yi demonstrates an unwavering quest for freedom and love. Nevertheless, owing to the interplay of new and old ideologie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ime, she embodies an acutely contradictory "Thunderstorm personality". Caught between the poles of love and hate, she vehemently resists feudal ethics and morality. Yet, she is ultimately unable to escape the bondage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thus moves towards ruin.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Fan Yi's tragic destiny, Cao Yu not only vividly depicts the awakening process of early female self-awareness but also profoundly reveals the detrimental impact of feudal autocratic thought on women. This work conveys deep concern regarding the survival plight of women in the feudal era and reflects on the issue of women's liberation.

## Keywords

Feudal era; Fan Yi; Female image; Self-awareness; Thunderstorm personality

# 封建时代下的女性形象——以《雷雨》繁漪为例

励妍

浙江树人学院, 中国·浙江 绍兴 312028

## 摘要

本文以《雷雨》中的繁漪为研究对象, 聚焦封建时代背景下这一女性形象的悲剧特质。繁漪身处封建专制家庭的压迫之下, 表现出对自由与爱情的执着追求, 又因新旧思想的交织与时代局限, 呈现出极端矛盾的“雷雨性格”——在极致的爱与恨中挣扎, 以激烈的反抗对抗封建礼教, 却终因无法挣脱男权社会的枷锁走向毁灭。通过对繁漪悲剧命运的刻画, 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思想对女性的戕害, 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早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让读者产生对女性解放的思考。

## 关键词

封建时代; 繁漪; 女性形象; 自我意识; 雷雨性格

## 1 引言

“五四”思潮的影响下女性意识逐渐觉醒, 具有典型特点的悲剧女性形象在曹禺的剧作中占据主体地位。曹禺现实主义的笔触下描写的女性形象是时代悲剧与自身悲剧的结合体, 从其对人物的塑造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曹禺对当时进步女性的鼓励和赞美之情以及对黑暗罪恶的旧社会的强烈愤懑之情。曹禺以激烈方式宣泄压抑情绪, 借家庭矛盾与对封建家庭腐朽思想的批判, 折射出深层社会及时代问题<sup>[1]</sup>。曹禺在《雷雨》中借繁漪雷雨般生命激情冲击封建家长制、追求自由, 其对自身处境的敏感与恐惧, 既体现曹禺对社会环境的窒息感, 也表达了他对先觉者、反叛者命运的忧虑<sup>[2]</sup>。

【作者简介】励妍(2004-), 女, 中国浙江宁波人, 在读本科生, 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 2 繁漪的形象特质解析

### 2.1 出场描写的象征意义

曹禺对繁漪的出场描写独具特色,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咳嗽)”, 正面出场时刻画其为果敢阴鸷的女性, 脸色苍白、唇微红, 眼大而灰暗、鼻梁高显, 通身黑色旗袍镶灰银色花边, 手持蒲扇挂于指下, 眼睛略塌; 十八年的压抑生活让她心灵失却活力, 如“石头一样的死人”, 在“残酷的井”中静待死亡。

繁漪的出场以听觉先行的“病态暗示”颠覆了中国传统小说“视觉先行”的描写范式, 给人以一种沉闷不祥的感觉。这种独特的声音肖像较之视觉描写更具穿透力, 与《红楼梦》中王熙凤“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的出场形成深刻互文, 但后者通过笑声展现其张扬的权势, 而繁漪的咳嗽声则暗示着生命力的衰亡。“眼睛略微塌进”这一细节既是长期病痛的身体印记, 更是灵魂逐渐萎缩的具象化呈现。这一特征与后文“石头一样的死人”的比喻形成严密的形象逻辑链,

暗示繁漪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僵化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0年代新女性普遍追求个性解放、以鲜艳旗袍彰显现代意识的时代背景下，繁漪却选择“黑色旗袍”这一逆向的服饰符号。这种刻意的色彩背离不仅是对时代的沉默反抗，更是其内心死亡的视觉外化；蒲扇这一传统闺秀的优雅配饰，在她手中却呈现“挂在手旗下”的颓唐姿态，与古典文学中“执扇掩面”的娴雅形象形成尖锐对比，暗示其精神支柱的彻底坍塌。这种通过日常物象的变形使用来表现人物心理的写法，体现了曹禺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创造性转化。

## 2.2 “雷雨性格”的内核与矛盾性

曹禺曾说：“《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比较感觉真切的是周繁漪。”繁漪这一角色被称为具有“最雷雨”的性格。她是剧本的灵魂。也正是这种“剧本灵魂”的设定，繁漪超越角色范畴成为叙事动力源。她的每个行动都在推动其他人物关系网的重组，曹禺通过着笔最多的创作自觉，在繁漪身上实践了契诃夫的现代戏剧理念，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囊括了内在的精神风暴和深刻的内在冲突，涌动着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戏剧潜流”。繁漪是一个受到“五四运动”思想感化的女性，在周朴园让她喝药时便有体现，“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最残酷的爱”与“最不忍的恨”的悖论式表达，这种爱恨同体的特质，使繁漪超越了传统痴情女子的扁平形象。繁漪对周朴园的反抗不仅是家庭矛盾，更是启蒙理性对封建礼教的结构挑战。这种矛盾性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美好理想与现实困境的多重撕裂。

## 2.3 行为实践中的矛盾呈现

### 2.3.1 对封建秩序的挑战——与周朴园的对抗

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满是压迫的周公馆，与周萍的感情是繁漪悲剧生活的延续。她想冲破束缚追求自由与爱情，将周萍视作带她脱离这种无趣生活的救命稻草。可周萍却太过软弱。“我都已经预备好了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要我。骗得我苦死，慢慢的渴死。”尽管她拼命反抗，也始终挣脱不了旧社会的枷锁。“我在这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活阎王已经十八年了，然而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

### 2.3.2 情感纠葛中的悲剧延续——与周萍的不伦关系

对于繁漪爱上空虚懦弱的周萍这一问题，曹禺认为根源在于她身处周朴园这样的封建家庭的命运；这并非繁漪之过，而是时代的不幸，是封建专制下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新女性共同的不幸<sup>[3]</sup>。一个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年代，那些觉醒于封建铁幕之下却依然执着追寻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注定要承受理想与现实撕裂的痛楚。在周公馆的牢笼里，唯一可以让她爱，唯一可以帮她实现爱情。理想的人只有周萍，她怀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在心中不自觉地吧周萍理想化了。

“这个家，我再也受不了了，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

她是绝望而又急切想要脱离现状，她陷入封建时代的泥潭即使拼命想抓住那一根救命稻草逃离现状却越来越无法自拔，困住她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周繁漪身上有时代女性强悍的生命力和战斗精神，可也正因如此，她身上的悲剧色彩才更加浓烈。

“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绝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小心，现在风暴就要起来了！”<sup>[3]</sup>”的台词，暗示了对周萍的报复，凸显其强烈的内心情感；她敢爱敢恨、性格鲜明丰满，却在困兽之斗中最终为爱疯癫。<sup>[4]</sup>

繁漪的每一次登场，都会让戏剧中的关系瞬间紧绷。她是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力量，在精神境界上，远超所有与她产生冲突的男性角色。然而，当她面对周萍与四凤的感情时，却表现出百般阻挠的姿态。她暗中跟踪周萍，放下姿态哀求他，甚至不惜在众人面前公开两人的私情以逼迫对方就范，这些行为都暴露了她爱情观中的扭曲与偏执。她在这场闹剧里表现出的是一种不甘，这种不甘一直缠绕包裹她许多年了，以至于呈现的是一种扭曲的状态，包括她和周萍之间违背道德伦理的感情，也是压迫下必然的结果。

繁漪的性格中存在一种独特的“男女同体”特质：既有女性对情感生活的渴求、在感情里的依赖倾向以及为情倾尽所有的心理，又兼具男性般的控制欲、果决敢为的魄力乃至行动力<sup>[5]</sup>。过往的评论多聚焦于她性格中的女性特质，却忽略了男性化的一面。在我看来，这种融合了两性特征的性格特点，同样值得深入探究。

## 3 繁漪悲剧命运的成因探析

### 3.1 封建专制下男权社会的压迫

《雷雨》中的周朴园，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典型维护者。他让鲁四凤给繁漪送药、逼她喝下的举动，乍看之下仿佛是丈夫对妻子的关怀，塑造出一副模范丈夫的假象，实则不然。成长于封建大家庭的周朴园，早已被“男尊女卑”的思想深深浸染，他绝不容许包括繁漪在内的任何人有丝毫反抗。其本质目的，正是借封建制度的枷锁压榨女性，以此巩固自身的权威与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sup>[6]</sup>。繁漪虽身为周公馆的女主人，却在家族中毫无实质地位。她生性谨慎，内心深处又渴望真挚的爱情。在旧社会封建家庭理念的桎梏下，她与周朴园之间的情感矛盾和权力冲突不断激化，最终促使她与周萍产生了不伦关系。而繁漪自身矛盾的性格，又让她对爱情的渴望逐渐扭曲，转化为对压抑人性的周公馆的深切怨恨。这种怨恨既是对个人不幸命运的控诉，也是对封建家庭制度的无声反抗，进一步凸显了她在封建枷锁下的挣扎与绝望<sup>[7]</sup>。

### 3.2 个体与时代的冲突

繁漪生在我国封建王朝时期，历经了“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在价值理念上，既保留封建礼教的印记，又有变革、创新的新思想，这便为繁漪既向往个性解放又坚持封建

思想的复杂性埋下了伏笔<sup>[8]</sup>。

尤其在遭受周萍的拒绝后，这位向来隐忍的女性毅然选择反抗与复仇，决心将积压多年的愤懑与压抑彻底宣泄。她身上这种“雷雨”般的激烈性格，既赋予了她打破桎梏的勇气，也推动着她在极端行为中走向毁灭——在摧毁他人、倾覆家庭的同时，最终也将自己卷入了悲剧的漩涡。这种毁灭性的爆发，既是新旧思想在她身上剧烈碰撞的结果，也折射出封建压迫下觉醒者难以挣脱的命运困局。繁漪虽以勇敢姿态追求自由，突破了封建礼教的部分束缚，但其身上仍留存着封建传统女性的局限性，与真正实现自由独立的现代女性有着本质差异。即便她拥有如雷雨般炽烈决绝的性格，却终究是时代与家庭环境造就的可怜人，封建专制的社会背景、压抑窒息的周公馆氛围，早已为她的人生埋下悲剧的伏笔，让她的反抗注定在新旧思想的撕扯中走向毁灭，成为封建时代女性觉醒者难以挣脱命运枷锁的缩影<sup>[9]</sup>。

曹禺笔下的繁漪，生命如电火般炽热而短促，行为矛盾且极端——爱时热烈如火，恨时亦能将人烧毁。这些意象既构建了她性格的悲剧性本质，暗示着繁漪的这种极致燃烧必然导致能量耗尽。

## 4 繁漪形象的时代意义与文学价值

### 4.1 女性意识觉醒的早期典型

繁漪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专制势力的强大与男权社会的重重压迫，周公馆这一监狱般的封建家庭环境，以及周朴园所代表的封建家长制对女性的压榨，让她难以挣脱束缚；另一方面，其反抗始终未能跳出个人情感的范畴，未能触及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与经济独立等根本问题，她对自由的向往寄托于与周萍的感情，这就注定了反抗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恰恰启示我们：封建时代女性的真正解放，既需要如繁漪这般打破封建精神枷锁的勇气，展现出“雷雨”般的反抗力量，更离不开对封建制度的系统性变革，唯有如此，才能为女性的独立与自由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繁漪这一形象，也因此成为审视封建时代女性在反抗与局限中挣扎的典型，映照出她们在新旧思想碰撞下的生存困境。

### 4.2 文学创作的典范价值

曹禺对女性形象的关注在戏剧家中是超乎寻常的。曹禺从女性主义的定位出发，剧作反映出旧中国封建家庭的黑暗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总体来说无疑是进步的、有力量的。曹禺对她们也始终怀着同情又关怀、温

柔而赞美的态度<sup>[1]</sup>。他对女性角色的揣摩是精致而准确的，曹禺笔下的女性人物丰满而灵活，性格多样。才塑造出繁漪这样充满爆发力和生命力的女性角色<sup>[10]</sup>。在繁漪的“雷雨性格”里，曹禺既赋予她打破封建礼教的勇气，又让她因时代局限走向悲剧，字里行间暗含对女性解放路径的思考：封建时代的女性解放，绝不仅是个体情感的突围，更需冲破整个男权社会的结构性枷锁。曹禺通过塑造繁漪这一“剧本灵魂”，以其悲剧命运完成了对封建制度的无声抗议，寄托了对封建时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怀，也为后世留下对女性解放命题的长久追问。

## 5 结语

综上所述，繁漪作为《雷雨》中极具复杂性及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是封建时代女性在压迫与觉醒中挣扎的缩影。她以“雷雨”般的激烈性格冲击着封建枷锁，既展现了对自由与爱情的执着追求，也因时代局限与自身矛盾走向悲剧，其身上交织的爱与恨、反抗与沉沦，深刻折射出封建专制对女性的戕害，以及新旧思想碰撞下女性命运的艰难与无奈。曹禺通过对繁漪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完成了对封建家庭与社会的有力控诉，更让我们看到了早期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微光与沉重代价，为后世理解封建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精神世界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本。

## 参考文献

- [1] 杨曼.曹禺早期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的悲剧塑造——从《雷雨》到《日出》[J].新纪实,2021(30):53-55
- [2] 陈晓娟.苦闷精神的寄托[D].新疆大学,2013.
- [3] 曹禺.曹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86.
- [4] 曹学琴.曹禺悲剧创作中的人文关怀——以《雷雨》《日出》《北京人》中女性形象为例[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8(02):107-109.
- [5] 陈晓娟.苦闷精神的寄托[D].新疆大学,2013.
- [6] 刘岩恕.马克思主义女性观视域下的曹禺戏剧作品女性形象研究[D].西华大学,2021.
- [7] 赵真华.男权制下的挣扎与追寻[D].延边大学,2011.
- [8] 傅亮.论《雷雨》中女性悲剧形象的角色塑造[J].普洱学院学报,2022,36(01):80-82.
- [9] 李伊晴,沈祺.《雷雨》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分析[J].戏剧文学,2020(08):76-80.
- [10] 胡远征.浅析《雷雨》中繁漪和侍萍的女性形象[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22(05):56-58.